

第一章 西方汉学早期发展脉络

一、19 世纪以前的欧洲汉学

西方汉学的源头是欧洲汉学。欧洲人最初从传说里得知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中国，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魅力，欧洲人对人类的童年文化很感兴趣，因此非常向往中国，无意中形成了敬慕古老的中国文明的风气。到 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达到高潮，后世的汉学家称之为“亲华热”。

最早到达中国的多为南欧和西欧的沿海国家人士，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他经欧亚大陆陆路到达元朝大都，为元朝廷工作 17 年后从海路返回威尼斯，向欧洲人渲染了中国的物质文明。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这时已传到欧洲，中国的园艺、建筑、戏剧等物质和精神产品也已成为世人所知。到 17 世纪欧洲“亲华热”达到高潮时，欧洲人在很多方面采纳和模仿了中国的物质文明，如用中式花纹和图案装饰建筑物、家具、瓷器。后来，英国人甚至在伦敦西部皇家植物园里建造了一座十层中式宝塔；法国的“汉风”也曾轰动一时，巴黎曾上演戏剧《中国孤儿》，一度把中国当做歌舞升平、法律有度的典范之地。再后来，亲临中国的人越来越多，目睹了中国贫穷落后的一面，汉风不再盛行，但在欧洲人的日常生活里始终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印迹。

16 世纪至 18 世纪，欧洲的耶稣会士作为天主教内顽固反对宗教改革的集团，大量派人到亚洲、非洲和美洲传教，抵达中国时适逢明朝中叶 耶稣会士在中国创办学校 讲授拉丁文、希腊文及文学、历史、地理知识，传播宗教学说与自然科学知识，同时把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诉诸文字传回欧洲。由于交流的载体已从器物演变为文字，因而形成了最初的汉学。后人在总结汉学发展史时便把这个时期概括为“传教士书简阶段”。

总结欧洲汉学早期发展的论述很多，近年来较具权威性的文献可以以《欧洲研究中国·欧洲汉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① (*Europe Studies China*) 为代表。该书收集了提交给 1992 年 4 月于台北举行的“欧洲汉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 29 篇论文 作者多为欧洲著名汉学家，分别从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不同艺术领域和汉学史上代表人物的角度总结了欧洲汉学，其中的四篇对于完成介绍汉学领域中的史学成果的重任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本章的论述将多次引用其论断、观点和史料，这四篇论文分别为：

《中国研究 欧洲汉学史简评》^②，作者为德国巴伐利亚学术院教授、《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主编傅海波 (Herbert Franke)；

《19、20 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的几个主题》^③ 作者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社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晚清史专家巴斯蒂 (Marianne Bastid-Brugaière)；

《欧洲的中国史研究》^④ 作者为移居美国、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瑞典汉学家毕汉斯 (Hans Bielenstein)；

《中华帝国早期史 西方学者的贡献》^⑤ 作者为《剑桥中国秦汉史》主编英国剑桥大学东方系鲁惟一 (Michael Loewe) 博士。

众所周知，法国汉学在早期的欧洲汉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领先地位，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和汉学活动是欧洲汉学史里最为活跃的篇章，因此，专门总结法国早期汉学的文献对于本章的写作极为重要。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介绍法国汉学的工作在了解和研究欧洲汉学的整个领域里也处于成果最多的位置，近年出版的《法国当

代中国学》一书虽以介绍当代法国汉学为主，仍包含了著名学者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的《法国汉学研究史》^⑥一文，此文与傅海波等四位学者的论文交互呼应，提供了欧洲早期汉学发展重要的轮廓线。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学界介绍海外汉学的力度加强，出版了多种工具书、译著、研究专著和丛书，其中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一辑开篇未署名“前言”的第一段话为宏观地认识整个汉学提供了手笔很大、文字又很精练的论述，由于这段话对认识欧洲早期汉学极有启发，故引述如下：

“从公元前一二百年起希腊人得知东方有个‘赛里丝国’（丝国）至今漫长的两千多年来，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逐渐克服了地理、语言、文化、社会心理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隔绝，经过了山海经式的传说阶段、马可·波罗和伏尔泰的传教士书简阶段、翟理斯和考狄尔的人文科学第一阶段及沙畹和马伯乐的人文科学第二阶段，走向了今天以李约瑟和施坚雅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阶段”^⑦

（一）耶稣会士的宗教精神

欧洲本土的“亲华热”伴随着耶稣会士的宗教热情，欧洲人不必亲临中国，从耶稣会士的作品就可以了解中国。耶稣会士在中国最活跃的时代恰好处于傅海波所谓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发展到了“发现的时代”，后人从这个时代看到以好奇心和求知欲为代表的世界精神。

耶稣会士使欧洲人了解了中国，但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汉学家，根本的动机是传播宗教，研究中国文化只是传教的手段。但是强烈的宗教热情使他们迸发出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长期居留于中国学习艰涩难懂的中文，借熟读古文、经书与中国士人结交，甚至加入中国官员队伍以便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现实，热衷于把儒家学说与天主教义融而为一等等，耶稣会士的全部活动全为一个目的，即完成宗教使命、促使中国人信奉欧洲宗教。

但是传教士的活动形成了事实上的早期汉学，其成果不仅限于

传回欧洲的文字和作品，他们进入中国以后的活动和摸索都对致力于认识中国的同道和后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的经历在早期汉学史上即为有代表性的一例。利玛窦居留中国近三十年并逝世于中国，当代中国人在利玛窦墓（位于北京行政学院院内）前停留时很难不因他与众多同仁长眠于此的献身精神所动。利玛窦为欧洲汉学留下了明末中国的第一手史料，但是他初到中国时也曾经经历过很多波折。最初他以为以佛教徒的面目出现会易于为中国人接受，但是他发现在中国南方，佛教徒并不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于是脱下僧袍改穿商人衣服，最后他终于认识到应该去北方接近朝廷和绅士、官员阶层，为此他不懈地学习中文，熟读儒家典籍，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谋得明朝廷官职并在此基础上宣传基督教教义。利玛窦的基本策略是避免激怒中国人仇视欧洲宗教，因此成功地深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进入中国社会的最高层，同时当上了罗马教会派驻北京的第一任代表^⑧。

利玛窦在中国朝廷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接受中国礼仪，因而与朝廷达成和谐共存。但是这种做法遭到激进的欧洲宗教人士的反对。1715年，罗马教皇明令取消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禁止他们按中国礼仪行事，结果中国皇帝被激怒，于1774年下令解散耶稣会士传教团。到19世纪在中国传教的已经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这时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已有了根本的改变，中国已成为负面形象，同时，新教传教士采取了与耶稣会士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狭隘兼生硬。

美国当代汉学家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在《神奇的土地 耶稣会士迎合中国习俗的策略和中国学的起源》^⑨（*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一书里追溯了汉学产生时期耶稣会士的作用。孟德卫非常珍视灵活的、感情渗透的方式，描述了耶稣会士迎合中国人习俗、风尚的做法，如参加尊孔、祭祖等活动，并把它归结为一种策略。耶稣会士似乎是天然的人类学家，实践

使他们认识到两种文化只有处于平等地位才能互相借鉴和吸收，因此能成功地吸引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自己则以成为“中国通”而自豪。孟德卫还揭示了迎合中国习俗的策略为现代中国学奠定的基础，他着重指出，“17 世纪欧洲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是耶稣会士发自中国的史料性报道及他们发表的介绍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著作”，而“17 世纪欧洲吸收中国文化的重要领域是历史年代学和语言”（见注⑨）。

耶稣会士的汉学成就给欧洲人带来的收益可以用傅海波的一段话进行表述：

“中国文明的伟大时代，它代表的稳定和强烈的物质文化引起了一种信念即非基督教教义也能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基础。中国成为由智慧的皇帝和哲学家领导的那一类国家的代表。”（同注）

这段话不仅表明中国文明使欧洲哲学和宗教界发现了新的参照系统，还对中国文明和政治制度的特点作了睿智的概括。同时，笔者认为，耶稣会士迎合中国习俗的策略为处于“发现的时代”的欧洲知识界增加了学养。这种策略与现代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有或隐或显的联系。人类学家长于深入被西方国家视为落后的地区或民族住地进行考察，对种族中心主义偏见产生的流弊比较敏感，他们移情于被考察对象，用参与的方式与被访者融和，取得近经验和真知识，这就比用冷静的心态从文献入手进行分析、研究的历史学家更容易窥透研究对象的底蕴，取得突破性成果。当代汉学成果在欧美现代历史科学产生以后才得以形成，治中国史的汉学家的必修课之一即历史人类学。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与 17 世纪的耶稣会士遥相呼应。

（二）异期的汉学与历史学

耶稣会士时代汉学活动的地点主要在中国，但是其成果显然成为欧洲汉学的起点。这些成果按照巴斯蒂夫人的归纳主要为三项：第一是大量的翻译工作，主要表现为中国古文典籍和文学作品的西文译本；第二是纪实性作品，如游记、出使报告、经商的记录和文件、日记、书信等，这类作品使许多没有去过中国的欧洲人对汉学产生兴

趣；第三即耶稣会士给欧洲送去了最早的中文藏书。这些书籍大多为 17、18 世纪中国皇帝的赠品，包括编年史、正史、传记、古籍汇编、百科全书、地方志、法令、法规、仪典和古地图，收藏在欧洲 4 个著名的大都市里（巴黎、柏林、圣彼得堡和伦敦，见注 1）。

纪实性作品的作用自不待言，它促使一些优秀的学者和学生加入了汉学工作者的队伍，还提高了欧洲公众对中国的兴趣，当年的作品最起码获得了新闻报道上的效果，今天则成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耶稣会士带到欧洲的藏书，在当年是欧洲汉学生存的基本条件，经过学院式的保存和整理，欧洲汉学才谈得上初具规模。时至今日，几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藏书已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全球范围共同财富，由于许多版本在中国已经失传，有些中国学者不得不专程赴欧洲收集珍藏孤本，辑佚成册，比如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的李孝聪辗转欧洲各国数月，回中国后辑成《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年）。

耶稣会士进行的三项工作当中引起后人产生的非议集中在如何评价当年的翻译作品。事实上不仅在耶稣会士书简阶段，即便在 19 世纪正规的学院式汉学产生以后，欧洲汉学成果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大量的、必要的中国哲学、文学和史学典籍的西文译本。它们既是各种课题研究的基础、引文的来源，也是初入汉学的必读书，即便是中文非常优秀的学者或学生也要借助译文迅速进入某一课题的语境，了解较多的背景资料，进入论文、论著的写作过程以后，有了好的译文，就不必在引用原文时重新翻译一遍。因此，译者的贡献非常重要，在汉学产生初年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尤其重要。翻译家皓首穷经，用毕生精力为汉学做了铺垫的工作，但是在他们进行工作的时代，历史学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历史学本身的建设尚处于萌芽阶段，当代学者用现代的标准衡量那个时代汉学家的工作，就会提出看起来十分残酷然而却不无道理的批评。移居美国的著名瑞典汉学家毕汉斯在欧洲汉学史学术会上提出：

“耶稣会士是重要的中介人，但他们并没能改变我们对中国历

史的理解，他们选用的史料也有限。当汉学逐渐成为欧洲主要大学承认的学科时，致力于汉学的人主要的工作是翻译。恰当地翻译很难的文献当然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译文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有教育上的效果。但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比在一个时期内普及知识更重要。……我们不再需要沙畹和德效骞，因为我们能阅读原著。但是能读书并不能导致对史料产生自动的理解，因此我们需要史学方面的训练。”（见注 　）

究竟什么样的工作才属于真正的史学研究？史学训练的内容是什么？毕汉斯从史学家发现和破坏史料的角度谈了自己的认识，并概括了研究活动的三个步骤：提供史料，进行文献批评，提出适当的问题。现在看耶稣会士触及的史学问题即是耶稣降生相当于中国哪朝哪年这样的问题，利玛窦曾发现犹太教传入中国开封市，但他始终未能考证出具体的年代。生活在以哲学、神学和宗教研究为重心的欧洲文化和学术环境里的汉学家初入中国研究领域首先注意经学、佛学或老子、庄子，这是很自然的。了解一种外国文化最先注意它的文学作品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中国的人文学者多从文学和叙事史学的作品入手进入某个学术问题，阅读文学作品也常从近代文学一段一段上溯至古典作品及至深奥的断简残篇。总之，在耶稣会士时代的汉学里看不到凸显的史学研究，这与当时欧洲学术文化的大环境是不矛盾的。

傅海波在欧洲汉学史国际会上的演讲是开局第一篇，他简要地介绍了汉学初起的年代里欧洲各国不同的情况。众所周知，欧洲汉学的发轫与传教活动相联，但是宗教目的并不是惟一的因素，汉学的兴起也缘于欧洲列强工业革命以后海外扩张、贸易和殖民统治的需要。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在 16 世纪就从海路抵达菲律宾和澳门，但西、葡两国并未出现汉学的发展。荷兰从 17 世纪起称霸海上 成为扩展海外贸易的新锐，后来在东南亚夺取殖民权力，长期以来荷兰汉学在欧洲各国处于领先的位置。俄国汉学是欧洲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俄国自身历史的变化和国际政治秩序的格局，俄国汉学

总不能得到欧洲学界的关注。俄国重视中国研究，这很容易解释。俄国人自 17 世纪进入西伯利亚，与中国共同拥有长达数千英里的边界线，俄国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条约的欧洲国家，因此有鲜明的利益驱动研究中国和满族。1727 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国派出大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北方，俄国驻北京传教团留下的文字资料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其中有许多珍贵的史料。傅海波认为英国人长期不间断的汉学研究缘于三重动机：传教、贸易和殖民统治。在傅海波看来，德国人治汉学的动机最为纯粹，德国学者具有特殊的、超越世俗利益的学术好奇心，在德、中之间没有贸易关系的时代，在治汉学的学者得不到教授头衔的时代，德国汉学就已经取得了不凡的业绩（见注⑤）。

不过，无论是身为德国人的傅海波还是其他欧洲学者都公认法国汉学是早期欧洲汉学里最先锋的部分，巴黎被誉为“西方汉学之都”（见注⑥）。法国人研究汉学的动因起码在相当的程度上与德国人相似，即不完全由于殖民扩张的需要，耶稣会士不仅承担着传教的重任，他们也是最早接受和传播中国文化、中国知识的学者。法国政府自 17 世纪以来通过国际性的耶稣会组织得到在中国传教的地盘，建立了法国传教区。法国耶稣会士继承了利玛窦的策略，努力与中国朝廷和统治集团建立联系，接近、了解并研究中国文明。戴密微认为法国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最初使命是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而不是宗教，因此他把 1685 年六位获“国王数学家”称号的耶稣会士乘船赴中国这个历史事件当做法国汉学创立的标志（见注⑥）。康熙皇帝对六位数学家介绍的西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还明确承认法国传教士在同俄国签订条约的外交使命中的功绩、在军事和科学技术方面为皇朝做出的贡献。康熙皇帝还满足了法方人士的要求，为他们延师讲授中文和满文，在北京建一座教堂并允许其他传教士来中国。

19 世纪以前法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按照巴斯蒂夫人的评论，以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神父和冯秉正（J. F. M. A. de

Mayriac de Mailla, 1669—1748 神父的著作最具代表性(见注 1)

《耶稣会士书简集》自 1703—1818 年陆续问世,杜赫德神父编辑了其中的第二卷,出版于 1711—1743 年。耶稣会士们在这部书简里就自己行中国礼仪引起的争论明确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了欧洲在中国传教区的利益所在,同时提供了珍贵的清朝史料。杜赫德神父参与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出版于 1735 年)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文学作品的法文译文集,巴斯蒂夫人从史学的要求出发批评了这部大作:

“这种用文学方法观察长时期的中国历史的作品脱离了欧洲公众对世界历史的一般认识。”(见注 2)

半个世纪以后,由在北京的最后一批耶稣会士完成的《中国杂纂》问世,提供了《中华帝国全志》未能收入的《诗经》和元曲的法文译本。戴密微认为可以把这两部作品当做耶稣会士时代最终的、可靠的成果,《中国杂纂》尤其表现了典型的科学态度(见注 3)

冯秉正的《中国通史》于 1777—1783 年同样出版于巴黎,洋洋洒洒 13 卷,内容为朱熹《通鉴纲目》的法文译文并包含明清时期的史料。戴密微说它是根据中国史料编辑的“一部完整的西文中国史”。戴遂良(Leon Wiegner)、宋君荣(Antoine Gaubil)、钱德明(Amiot)等 18 世纪著名的耶稣会士学者继冯秉正在历史文献、满文、蒙古史、孔子及儒家经典、兵书等课题上做了翻译和最初的研究工作。戴密微认为把中国古代经典译成法文十分必要,并以此评价各位耶稣会士学者的功绩。但是戴密微认为不必用许多精力把基督教教义和科学著作译成中文,他还抱怨那个时代没有好的汉语词典和语法书籍。这些重任只能由后世学院里的汉学教授们完成了。

1742 年,罗马教皇降旨批评耶稣会士行中国礼仪,1773 年下令召他们返回欧洲本土。当时只有十几位法国耶稣会士留在北京,钱德明神父是驻北京传教团的最后一任会长,1793 年逝世于北京,恰逢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至此,传教士书简阶段的汉学走到了终点。

但是在那个时代,法国本土的中国热尚不能完全归因于传教士

的活动，当时的很多思想家都对中国的兴趣。比如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就说中国的名声比法国某些省份还更为人们熟悉。伏尔泰思想的中心内容是批判中世纪神权统治，嘲笑天命论，阐扬近代的科学精神和商业精神，政治上主张实行开明的专制统治，企求千年福王国。他无意于撰写历史著作，只写哲学论文，也写小说。伏尔泰之所以成为汉学史上的著名人物是因为他在晚年时十分迷恋中国，写了剧本《中国孤儿》。该剧于 1755 年在巴黎上演，二百多年后，由于中法正式建交而再次上演（见注⑥）。

伏尔泰的时代有不少人希望在巴黎建立可以与北京的耶稣会士相媲美的汉学学派。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源源不断地把汉文书籍送到巴黎，甚至还把黄嘉略、高类思、杨德望等中国人送到巴黎管理这些汉文书，但是法国大革命扫荡了一切，建立汉学学派的尝试突然结束了。许多努力都没有一个结果（见注⑥）。

（三 欧洲中国观的转变

耶稣会士汉学达到高峰的同时，欧洲大地自身的历史进程发展得非常迅速，各国相继发生工业革命，现代化思想十分普及，“先进”概念成为欧洲人考察社会进步程度的决定性标准，是否实现工业化，是否出现中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基本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中国观来了一个大转弯，中国热迅速降温，不但如此，还把中国当做失败的个案，因而断定中国需要外力施加现代化影响。英国人试图通过增加贸易额来改变中国，但是以内卷化（见本书第六章第四节）为特点的中国经济格局中的消费者无力购买英国的工业品，为此英国殖民者找到了鸦片这种特殊的商品，拉动了英国、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活动。向中国输出鸦片的决策者遭到具有良知的英国人士的批评，但是中国贫穷、落后的论断却为社会广泛接受，表现在汉学上就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

欧洲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中国自身的确在走向衰落。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耶稣会士被新教教士取代的时段，中国的形象

朝负面转化，积贫积弱的颓势加剧，逐步沦为欧洲列强掠夺的对象。新教教士把中国描绘为贫弱、僵化、闭关自守、没有革新能力和个人自由的庞然大物，处于沉睡当中。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形象大为改变，来得这样突然和极端，其原因不能不从认识主体方面进行考察。

巴斯蒂夫人对这种转变作了最好的解释：

“18、19 世纪被先进概念浸染的欧洲思想家完全接受耶稣会士急于传递给欧洲的中国印象，即无时间限制的建立在伦理有序而无变化的儒家基础上的社会。他们仅仅改换了解释。表明社会组织是成功的那些证据现在在先进的欧洲人眼里却成为社会处于低级阶段的证据。（见注）”

巴斯蒂夫人还就先进概念与欧洲哲学、欧洲史学和欧洲历史现实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先进概念最初并不产生于史学研究，它形成于知识分子试图从 18 世纪欧洲盛行的绝对论逃出来所做的必要的努力当中，后来牢固地被欧洲大地上的工业发展、科学和政治改革证实了。（见注）”

二、19 世纪学院式汉学的兴起

欧洲的学校很早以来就开课讲授东方语言。

根据傅海波的介绍，希伯来文是欧洲人学习的第一种东方语言。因为组成基督教教义的《旧约全书》与犹太教经典有承继关系，欧洲学术界至今仍有一种很牢固的观念即认为世界上只有三种文明值得进行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和以色列文明。伊斯兰教是欧洲人最早接触的几种宗教之一，信奉伊斯兰教的欧洲人分散居住在巴尔干地区和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文化研究在欧洲学术里占重要位置，学校里很早就开设了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和波斯语课程。后来，欧洲人发现梵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印欧语言的祖先，从而热衷于研究印度。印度学包括梵文哲学和人类起源研究，印度文化里的浪漫主义也深受欧洲人喜爱。时至今日，印度式饮食和衣饰在欧洲日常生活里的普及

程度仍远远超过中国式。继印度之后引起欧洲注意的东方文明是埃及，再次就是位于远东的中国。但是，简而言之，当今欧洲和北美大学里研究中国学的专家在数量上与研究其他几种东方文明的已大致相等。

（一）汉学讲座的建立

随着 18 世纪耶稣会士撤离中国传教区，汉学中心从中国转移到欧洲本土，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硝烟以后仅仅 20 年，汉学不仅得到重建，还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开始成为高等学府里一门正式的学科。

按照欧洲学界的惯例，学院式汉学以授予汉学教师教授或终身教授的头衔为标志，因此法兰西学院 1814 年 12 月 11 日开设的汉学讲座作为学院式汉学建立的标志得到公认（见注 ⑥）。该讲座全名为“汉族和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法国也是最早教中文口语的国家。大革命发生以后不久，汉学就得到新层次上的重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学术界仍保持自己的传统、标准和工作上的连续性，这在欧洲并不奇怪，从长时段考察更是如此。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设立初年的几任教授即使用今天的标准去看也是当之无愧的，这一点以后还会提到。

其他欧洲国家在设立正式的汉学教授位置以前度过了较长时间，也就是说在 19 世纪初年和中叶的很长时期里，有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但是没有教授头衔。

德国直到 1871 年统一的时代一直没设立汉学教授的位置，于 1909 年在汉堡大学开设中文课，治汉学的教授仅为兼治汉学，他们的学术工作本身就可以确立其合法性，但是始终不能成为可以与法国汉学教授相比的大家。这个时期德中之间没有贸易关系，德国在中国没有殖民地。1871 年德国统一后，俾斯麦当政时期德国海外贸易兴起，并在中国夺得殖民地，而俾斯麦又鼓励汉学研究，于是专业汉学在大学里确立了。

英国直到 19 世纪后半叶的 1876 年才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设

立汉学教授的位置。傅海波对 19 世纪的英国汉学评价不高，认为充其量不过是在大学里增加了异国情调，但是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被后人誉为欧洲人文科学式汉学的代表人物，笔者以为这不仅由于他著述很多，还在于他的一个重要贡献，这个贡献在今天由于英语已成为国际汉学界的通用语言而变得更为凸显，即翟理斯与他的前任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教授合作，创立了汉语与英语间的转写方案和汉语读音音标，使英国人认、读汉字或在中英文之间进行翻译时有了一个通用的规则。中国文字统一但各地方言语音相差极大，试想如果没有一个通用的音标，英国人该怎样读中文？他们到中国来听到各种方言又该如何应对？

与传教士相比，翟理斯的个人经历很有特色。他出身于书香门第，1867 年 22 岁时到中国，在中国生活 24 年，先后任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和汕头、厦门、宁波、上海等地英领事馆官员，返回英国后于 1891—1932 年任剑桥大学汉语教授^⑨，翟理斯是在中国做外交官然后成为汉学教授的典型。他的另一个贡献是编写了一部类似《中华帝国全志》、《中国杂纂》的《中国文学史》为英语读者展示了东方风味的文学长廊（见注⑩）。翟理斯的学术活跃期比法国汉学讲座初设的时代晚，但是在学术发展的逻辑上应该把他放在学院式汉学建立的初年。

学院式汉学从两方面得益于耶稣会士，一是人员，二是图书。最早的汉学教授常有传教的经历，传教士送回欧洲的藏书则使以往从纪实性报道了解中国的教师和学生读到中国古文原文，这种全新的经历给治汉学的师生带来的震撼难以言喻。欧洲汉学教学至今仍以指导学生阅读中国历代古文为主要课程，傅海波仍提醒当代的汉学家恢复他的老师、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海涅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倡导的背诵中国古文的学习方式。戴密微曾批评耶稣会士没编出好的中文辞典和语法书，这项空白在 19 世纪汉学教授的督促下终于得到填补，由于欧洲人更容易接受满语，因此也编撰了古

代典籍的满文译本以便易于掌握汉文原著，当今的时代则由日文译本或中文白话本代替当年的满文本。此外，教学和研究工作需要的通史教科书、资料汇编、书目索引、百科全书、地图集等也先后被提到日程上并一一完成。

由于中文艰涩难学，且汉学系学费昂贵，欧洲大学里学中文的学生并不太多，教师们因而有较多精力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欧洲纯学术的传统本来就相对单纯的大学的环境相辅相成，现在汉学也能得益于此，实现学术独立。

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第一任教授雷慕沙（Abel-Rémusat, 1788—1832）睿智地发现中国史学典籍里载有不少研究印度史、亚洲史和世界史的宝贵资料。他指出，即便仅从欧洲史和世界史的需要出发也不应忽视中文典籍。今天看来，雷慕沙这样敏锐的史料意识已足够使他担任第一位汉学教授。雷慕沙博士论文的内容为中医，后来又以满文研究而为人瞩目。他特别注意在语言学基础上进行汉语教学，而他最重要的著作是逝世以后才出版的译著《法显撰 佛国记》（1836年），书后附有内容丰富的考证。由于耶稣会士比较注意儒家因此雷慕沙这部译著很引人注目（见注⑥）。

雷慕沙于44岁时死于流行性霍乱，其后任为他的得意门生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儒莲学习过多种东方语言，早期作品为《孟子》拉丁文译本（1824年）为了继承《佛国记》的译注工作，他译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853年）和《大唐西域记》（1857—1858年）这两部书被列入《汉文书籍目录译文丛书》纳入商业性出版物行列，以小开本、低价格赢得众多读者，很多旅客在乘坐火车时喜欢购读这种书籍，因此被戏称为“铁路图书馆”成员。汉学书籍成为普及的盈利的出版物，使儒莲的声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同时也使出版家找到了新的出版方向。今天，在欧美普通的书店里都会看到中文典籍的西文译本如《论语》、《老子》、《庄子》、《孙子兵法》等（见注⑥）。

儒莲的译著还有《突厥历史资料》、《景德镇陶录》、《赵氏孤

儿》、《西厢记》、《玉娇梨》、《平山冷燕》、《白蛇精记》。这些译本引起的兴趣至今不衰。

法国还有一所“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该院创建于 17 世纪，以培养近东语言翻译人员为目标，19 世纪 40 年代起开始汉语教学，于 1843 年设汉学讲座教授位置。欧洲这类语言学校的建立和延续在学术史上的作用大得难以估计，比如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留欧学生和当今的美国学者都到这些学校去学习自己需要的语言。

首任教授安东尼·巴赞 (Antoine Bazin, 1799—1862) 从未到过中国，但跟从儒莲学会了汉语。巴赞优秀著作的主题都围绕着语言研究和口语教学 他还翻译了四部元代戏剧：《? 梅香》、《合汗衫》、《货郎担》和《窦娥冤》。巴赞以后著名的德微理亚 (Gabriel Devéria, 1844—1899) 在法国人征服了越南北方时 发表了对公众及国务决策人均有价值的《中国与安南——越南关系史》(1880 年，见注⑥)，他还是涉足中国近现代史——太平天国史的几位先驱之一 (见注)。晚年的德微理亚回到不针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领域，语言方面他注意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文字如西夏文、女真文、鞑靼文和蒙文墓碑、拓片，他还研究了耶稣会士时代汉学家来不及涉足的伊斯兰教和摩尼教 (见注⑥)。

戴密微把微席叶 (Arnold Vissière, 1858—1930) 当做以翻译为汉学成果主要形式的时代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戴密微描述了他的个人风格，这种境界恐怕很多人没有达到，但很可能代表欧洲汉学家当年的追求：

“微席叶在旧制度时代讲一口无懈可击的汉语，他自己能撰写并抄正礼宾性文件，最终具有了中国文人的风度、言行、举止以及几乎与中国人毫无差异的情感了，有人传说，令人生畏的皇太后慈禧曾颇受这种模仿魅力的吸引。在他于东方语言学院 30 年的教学生涯中 (1899—1929 年)，微席叶表现为一位严谨而又认真的良师。他从不自认为具有高深渊博的学问，而是始终为此做准备却又不以此为目标。(见注⑥)

这种境界也是后世许多欧洲学者的追求 但是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治汉学的欧洲学者深受不能亲临中国之苦。

微席叶在法国汉学领域还扮演了类似于翟理斯在英语世界的角色。他的汉语音标法被法兰西远东学院和整个法国汉学界接受。当然 当今的法国汉学家都使用中国的“拼音”法（见注⑥）。

戴密微指出，如果在法兰西学院和东方语言学院的汉学讲座之间进行比较，那么前者注重讲授中国的知识、进行某课题的研究，重点在于学术；后者比较注重实用如外交上的需要、重视语言研究和教学。在学院式汉学与耶稣会士汉学之间进行比较，前者的长处表现在描述的准确性和方法的严谨方面，并准备把欧洲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汉学研究里 进行史料的考察和编排、对比、考证 但是由于不能像耶稣会士那样与其研究对象保持直接的、感性的接触，没有近距离地参与和体验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因此少了直观性和亲身参与后体现在学问上的深度和贴切。此外，戴密微认为他们还有“阻碍任何比较文化研究的欧洲优越感”（见注⑥）。

巴斯蒂夫人则把 19 世纪学院式汉学放在当时欧洲学术和欧洲历史学发展程度的大背景里进行考察。

巴斯蒂夫人指出，学院式汉学建立初年，欧洲学术里的历史学自身尚未发展为独立的、成熟的学科，汉学家因而也得不到比较确定的、公认的、可用于中国史的方法。她说：

“19 世纪第一个十年，欧洲史学仍处于为自己建立科学纪律的阶段。这个过程包括建立新的规则和批评的标准，提倡注意第一手史料和档案资料，也强调寻找新的研究对象和史学的新任务。史学研究建立在仔细地研究事实的基础上，进而解释产生于当时的欧洲政治事件主要行动者手里的民族国家的起源和特点。”（见注⑥）

这段话给认识欧洲史学的起源、欧洲史学理论与汉学的关系的中国学者透露了重要信息。欧洲学术一向以神学、哲学和宗教研究为主流，历史学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时代产生的，在事件发生以后，人们需要追究事件的起因和进程、主要行动者的动机和行为，而

中国史学从一开始就以记录最高统治者的言行为己任因而在传统文化里位于前列甚至是中心的位置。但是汉学家并没有自动运用欧洲史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中国作为“他者”似乎还可另作别论，只适合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方法研究中国，简单地讲就是只研究历史上留下的文字材料，阅读或翻译或转述，谈不到鉴别它们是不是第一手资料，也没有建立适当的评价中国典籍的标准。

但是问题也还有令人欣慰的一面。巴斯蒂夫人明确指出，先进概念产生以后，欧洲中国观戏剧般的转变只发生在哲学家当中，历史学家非常谨慎，他们没自动运用自己学科武器研究中国，但也没盲目追随制造戏剧效果的哲学家。欧洲历史学家也从未运用马克思“亚细亚”概念，其他学科的学者也没运用这个概念。作为资深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巴斯蒂对她 19 世纪前辈的要求也不是很低，她认为中国的古代文物和典籍实际上是研究人类和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宝贵史料，汉学家本来可以利用它们建设古代文明起源和原始社会的知识和理论，但是他们没有抓住机会，结果使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建设来自于深入到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中国学者姜广辉撰文说明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现实可以印证摩尔根的理论^①，巴斯蒂夫人则希望类似摩尔根的理论成果产生于 19 世纪的欧洲汉学家。

欧洲史学在 20 世纪初期和中期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产生于对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成绩主要由年鉴派学者做出——建立了开放的史料观。由于中世纪没有留下类似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中和工业革命过程中那么多的档案史料，中世纪史料以宗教史料为多，治中世纪史的权力一定程度上由贵族学者垄断着，因此年鉴学派的创新意义重大。这一次汉学没有错过机会，他们运用年鉴派理论研究了中国史。

（二）四个主题与 19 世纪中期汉学环境的变化

巴斯蒂夫人指出，学院式汉学出现以前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史研究的兴趣集中于四个主要的课题”（见注 ），19 世纪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和东南亚以后，欧洲汉学家再次得到进入中国的机